



凤凰文库
海外中国研究系列

刘东主编

「美」陆束屏 编著 / 翻译



A MISSION UNDER DURESS 忍辱负重的使命

美国外交官记载的南京大屠杀与劫后的社会状况

*The Nanjing Massacre and Post-Massacre Social Conditions
Documented by American Diplomats*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凤凰文库
海外中国研究系列

刘东主编

「美」陆束屏 编著 / 翻译



A MISSION UNDER DURESS 忍辱负重的使命

美国外交官记载的南京大屠杀与劫后的社会状况

*The Nanjing Massacre and Post-Massacre Social Conditions
Documented by American Diplomats*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忍辱负重的使命:美国外交官记载的南京大屠杀与
劫后的社会状况/(美)陆束屏编著. 翻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
社, 2018. 12

(凤凰文库海外中国研究系列)

书名原文: The Nanjing Massacre and Post-
Massacre Social Conditions Documented by American
Diplomats

ISBN 978-7-214-22973-1

I. ①忍… II. ①陆… III. ①南京大屠杀—史料
IV. ①K265.6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71667 号

AN MISSION UNDER DURESS: The Nanjing Massacre and Post—Massacre Social Conditions
Documented by American Diplomats by Suping Lu

Copyright © 2002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edition was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ing Group through
the Chinese Connection Agency, a division of The Yao Enterprises, LLC.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8 by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0-2016-512

书 名 忍辱负重的使命:美国外交官记载的南京大屠杀与劫后的社会状况

编 著 [美]陆束屏

译 者 [美]陆束屏

责任编辑 卞清波

责任校对 康海源

装帧设计 陈 婕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2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 张 32 插页 4

字 数 428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22973-1

定 价 96.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海外中国研究系列”总序

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但世界却并未因此而遗忘中国。令人惊讶的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就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各国的中国研究却得到了越来越富于成果的发展。而到了中国门户重开的今天，这种发展就把国内学界逼到了如此的窘境：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不仅必须向国内读者译介海外的西学，还必须向他们系统地介绍海外的中学。

这个系列不可避免地会加深我们150年以来一直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因为单是它的学术水准也足以提醒我们，中国文明在现时代所面对的绝不再是某个粗蛮不文的、很快就将被自己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一个高度发展了的、必将对自己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可正因为这样，借别人的眼光去获得自知之明，又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历史使命，因为只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去透过强烈的反差反观自身，中华文明就找不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当然，既是本着这样的目的，我们就不能只从各家学说中筛选那些我们可以或者乐于接受的东西，否则我们的“筛子”本身就可能使

读者失去选择、挑剔和批判的广阔天地。我们的译介毕竟还只是初步的尝试，而我们所努力去做的，毕竟也只是和读者一起去反复思索这些奉献给大家的东西。

刘 东

序

笔者十多年前在搜寻南京大屠杀期间英美人士目击证词的初始阶段,获得了一些由美国驻南京大使馆三等秘书约翰·摩尔·爱利生(John Moore Allison)1938年初从南京发给美国国务院与美国驻中国其他使领馆的外交电报。这些电报从美国外交官的视角,对惨绝人寰的屠杀以及恐怖笼罩的氛围、荒凉的城市、平民百姓遭受的苦难这些劫后南京社会的状况作了独特的描述。而令笔者印象尤深的是爱利生在中国往昔的首都所肩负的艰巨使命,以及他和领事小组的成员与日本同行以及日军当局所进行的斗争。

由于爱利生的电报大多数都是前后连贯有编号的,从自己所掌握的数量有限的电报来看,笔者意识到有一座外交文献资料的宝藏有待探索、挖掘。笔者非常感激美国国家档案馆的档案文献专家米尔顿·奥代尔·古斯塔夫逊(Milton Odell Gustafson),他指点迷津,提供了珍贵的线索,并引领笔者在美国国家档案馆的迷宫中踟躅穿行,去搜索、寻获爱利生留下的文件。没有他的帮助,这项任务是难以完成的,因为美国国家档案馆的文件是以主题而不是以文件的撰写者来分类的,而爱利生的电报涉及众多的主题、领域。

在位于马里兰州学院公园的美国国家第二档案馆内,笔者寻获了将近190份相关的电报、报告、备忘录和其他文件。在编辑过程中,明显的笔误,拼写错

误,标点符号的误用,以及漏字、错别字,或者直接加以更正,或者加注说明。除此之外,笔者努力使文字内容尽可能地接近原文的风格以保持历史的原貌。

在这些文件中,提及了众多的人名,地名,机构和街道的名称。没有足够的信息资料,读者很难对这些文件有透彻的理解。在广泛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笔者做了必要的注释,加以解释,提供简略的个人生平与背景信息以帮助阅读,使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这些文件。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现行的标准拼音系统汉语拼音,尚未面世。然而,韦氏音标系统(Wade Giles),以及它的诸多变体,还有陈旧的邮政系统的拼法如重庆(Chungking)、南京(Nanking)、北京(Peking),有时甚至随意信手拈来的拼音形式都被广泛使用。这不仅使还原中文的原文非常困难,而且也难以保持中文拼音的一致性。不幸的是,这些外交文件使用的人名、地名的拼音形式即是如此。虽然没有以汉语拼音的拼写方式来取代旧的拼音形式,但笔者只要能够准确地识别中文名称或短语的原文,便配以注释,除了其他内容外,提供其汉语拼音的拼写形式、汉字原文,以及电文中原有的拼音形式。就南京的拼写形式而论,在文件原文中保持了旧的邮政系统的拼法 Nanking。然而,编者在前言与注释中提及这座城市时则采用汉语拼音的拼法 Nanjing,不过在引文中仍然保留了 Nanking 的拼法。

同时,笔者借此机会感谢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校园科研基金会,该基金会提供的科研经费使这本书的出版成为可能。这个研究项目也得到了各方人士的帮助,在此谨致以感激之情。正如我前面提到的,米尔顿·奥代尔·古斯塔夫逊提供了宝贵的建议,为追寻这些文件提供了协助。特别感谢朱莉·道安·麦克林(Julie Dawn Macklin)为前言的草稿提供意见和建议。还要感谢巴波·透纳(Barb Turner)协助将一部分原始文件转换成电子文件。

陆束屏

2010 年于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

法庭的判决书陈述了强奸妇女的情况：

有很多强奸案。处死是稍有不从的受害者或者试图对其加以保护的家人经常遭受的惩罚。全城各处，甚至稚嫩女孩与老年妇女也被大批强奸，很多强奸案中还伴随着变态的施虐行为。很多女性在遭受凌辱之后被杀害，肢体支离破碎。日军占领之后最初的一个月内在城内大约发生了2万多起强奸案。^①

除了残暴地对待中国人以外，日军不加区别地闯入、洗劫、掳掠外国财产，侵犯外国利益。在日本发动最后的总攻之前，所有的外国外交官都已撤离。然而，仍有少数西方籍公民，包括14名美国人，在城市遭围困与大屠杀期间一直留在城内。在致力于为安全区内的中国难民提供食物和房屋，以及保护难民免遭日军迫害的同时，留下来的美国居民也尽其所能地试图保护美国财产。然而，他们的努力在全副武装的日本兵面前显得苍白无力。因此，虽然他们多次向日本当局提出抗议，但无济于事。城里的14名美国人联合要求美国外交官回城，希望他们能对美国的财产和利益提供有效而充分的保护。随着市政系统的崩溃，电话、电报和邮政服务不复存在，向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发送任何信息的唯一途径是向日本当局寻求协助，通过他们的军用无线电设备发送电报。美国人两次提出发送电报的请求，但是日本人一直没有将电报发出去。

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指示，一旦局势明朗，美国外交官将返回南京。日本人攻占南京两周后，美国军舰瓦胡号搭载着3人美国领事小组，于1937年12月28日从上海启程，前往位于南京上游约20英里的安徽和县，打捞在南京遭围困之际于1937年12月12日被日军飞机炸沉的美舰巴纳号。在协助打捞作业，特别是将美国驻南京大使馆的财物从巴纳号的保险柜中打捞上来后，领事小组将在南京登岸，重开大使馆。

^① R. John Pritchard and Sonia Magbanua Zaide (罗勃特·约翰·普理查德、苏妮娅·马格巴努亚·扎伊德)，*The Tokyo War Crimes Trial, Vol. XX, Judgment and Annexes*(东京战犯审判，第20卷，判决书与附录)，纽约：加兰出版社，1981年版，第49605至49606页。

美舰瓦胡号于1937年12月31日下午2时30分驶抵南京水域。观察到江边一带呈现出一片惨败混乱的景象,听到步枪的射击声,在城内各处见到小火在燃烧。^①停泊在南京旁边的英国军舰蜜蜂号船长告知美国官员:“〔日军〕仍不允许外国人在南京登岸,根据日军司令官代表的说法,1月5日之前不允许任何人上岸。他们所给的理由是,‘扫荡’行动仍在进行中,还不安全。”^②随后,瓦胡号在次日早晨驶往巴纳号沉船地点。

到1938年1月4日,在已将所有可能从巴纳号找到的东西打捞上来以后,美国外交官仍然没有获准在南京登岸。^③然后,瓦胡号于1月5日驶往上游,前往距离南京约50英里的城市芜湖,运送医疗用品给芜湖总医院,并查看美国居民和财产的情况。他们从留下的美国传教士那儿获悉,“日军占领最初的一个星期里‘残酷对待并屠杀平民,肆无忌惮地掠夺破坏’城内的私人财产。外国人的的人身能受到尊重,但无人看管的财产一般均遭偷盗。”^④

美国官员最终在1938年1月6日上午11时获准在南京登岸。他们“受到非常合作的日本领事、海军和陆军代表的接待”,^⑤不过他们对日本官员的印象很快就会改变。

二

美国领事小组以三等秘书约翰·摩尔·爱利生(John Moore Allison)为首,副领事詹姆斯·爱斯比与编码职员小阿契包德·亚历山大·

① 约翰·M.爱利生,1937年12月31日晚6时发未编号电报,原件藏美国国家档案馆,59档案组国务院档案,微缩胶卷M976组,48卷。

② 同上。

③ 约翰·M.爱利生,《来自草原的大使》,波士顿:豪顿·米弗林(Houghton Mifflin)出版公司,1973,第34页。

④ 约翰·M.爱利生,1938年1月5日下午4时发第4号电报,原件藏美国国家档案馆,59档案组国务院档案,微缩胶卷M976组,48卷。

⑤ 约翰·M.爱利生,1938年1月6日下午5时发第7号电报,原件藏美国国家档案馆,59档案组国务院档案,1795盒。

麦克法瑾为他的工作人员。

约翰·摩尔·爱利生(1905—1978)1905年4月7日在堪萨斯州的小镇霍顿(Holton)出生,是奥斯卡·约翰·爱利生(Oscar John Allison)与安妮·B.摩尔·爱利生(Annie B. Moore Allison)的独生子。他的父亲从事火炉经销、维修的生意,在他年幼时便举家迁往内布拉斯加州的首府林肯市(Lincoln)。爱利生在林肯长大、就学,1922年从林肯高级中学毕业后进入内布拉斯加大学,主修政治学,辅修英文。在他读大学二年级时结识了亚瑟·约金森(Arthur Jorgensen)。约金森多年前毕业于内布拉斯加大学,曾在日本的基督教青年会工作了15年。此时,他回到母校主持内布拉斯加大学基督教青年会的工作。与约金森的交往对爱利生往后的生活道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许多年以后,爱利生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出于某种原因,我一直向往能够去亚洲,而不是欧洲。”^①在约金森的影响下,爱利生决定去日本教英文。1927年6月大学毕业后,爱利生在基督教青年会的推荐安排下前往日本教书。

爱利生在日本待了两年,先在神奈川县的小田原(Odawara)中学、厚木(Atsugi)中学两所学校教英文,以后于1928年4月在位于京都舞鹤地区的日本海军机关学校(Naval Engineer Officer's Academy)教英语。一个偶然的机会,爱利生在火车上和一位美国商人相遇。闲谈之余,这位商人介绍爱利生去上海工作。于是,爱利生在1929年6月成为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上海分公司的推销经理。在上海,爱利生结识了不少朋友,其中有年轻的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同情中国革命的爱格妮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y),还有一位来自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Omaha)的老乡亚瑟·雷渥特(Arthur Ringwalt)。雷渥特当时在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任副领事。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并不是个从商的好年头。大萧条的到来断送了无数人从商谋生的前程。眼看着爱利生就要失业的时候,老乡雷渥特

① 约翰·M.爱利生,《来自草原的大使》,第1页。

在1930年4月把爱利生介绍进了上海总领事馆,在商务处做个职员,由此,开始了他的外交生涯。1930年10月正式通过美国国务院的外交人员资格考试之后,他晋升为副领事,被派往驻日本神户领事馆工作。为了更好地学习掌握日语,他在1932年2月到驻东京大使馆参加为期两年的强化学习日本语言、历史和文化的训练班,大大提高了他的日语能力。其间,他于1932年圣诞节为埃德加·斯诺与海伦·福斯特(Helen Folster)在东京操办婚礼。爱利生本人做伴郎,并说服在东京一所美国学校教授法语的玛丽·简妮特·布鲁克斯(Marie Jeanette Brooks)做伴娘。6个月后的1933年6月,爱利生又成功地说服帮忙做伴娘的布鲁克斯小姐做自己的新娘,不过,这段婚姻最后以离异而告终。

1935年11月,爱利生晋升为领事,被派往驻大连领事馆,1936年7月又奉调至驻济南领事馆。爱利生在日本生活了6年,在中国一直被安排在与日本人打交道的岗位上,1937年9月,当日军逼近黄河,离济南城只有4英里之际,他奉命关闭领事馆,撤往南京。此时,爱利生晋升为三等秘书,在南京待到11月,但日本人并没有越过黄河进入济南,许多离开这座城市的美国人也开始返回。美国驻华大使纳尔逊·杜鲁斯勒·约翰逊(Nelson Trusler Johnson)批准他返回济南。^①

然而,爱利生抵达济南仅几天,形势骤变。很明显,日本人将渡过黄河,进攻济南已迫在眉睫。爱利生接到国务院的指示,要他经青岛、上海,撤往南京。他在感恩节前抵达上海,当时南京周围的局势随着日军向中国首都逼近而变得紧张起来。驻上海总领事克莱伦斯·爱德华·高思(Clarence Edward Gauss)认为,爱利生在这种情况下去南京是不明智的。他给华盛顿发电报请示。美国国务院建议:“爱利生应该留在上海,直至局势明朗。”^②

日军攻占南京15天后,战事稍平,爱利生就率领美国领事小组于

① 约翰·M. 爱利生,《来自草原的大使》,第14至30页。

② 同上,第31至32页。

1937年12月28日踏上了前往南京的征程,并于1938年1月6日获准进入南京,重开美国驻南京大使馆。甫抵南京,爱利生丝毫没有想到自己会在美日之间的外交纠纷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也不知道他的名字将载入史册,后来成为“爱利生事件”的关键人物。他在南京工作的7个多月里,做出了非常出色的成绩,也给后人留下大量涉及南京大屠杀期间以及之后南京状况的珍贵记录。

爱利生1938年8月10日离开南京,回国休假。途中,在日本将1937年8月便从济南撤往东京的妻子简妮特接上船。夫妇俩回到内布拉斯加,和他的双亲久别重逢的喜悦自不待言。1938年底,爱利生奉调到驻日本大阪总领事馆。

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他和美国驻日本大使约瑟夫·克拉克·格鲁(Joseph Clark Grew)以及其他在日本的美国外交官一道被日方羁押了6个月,直至1942年6月美日两国相互交换被扣留人员。从1942年至1945年,爱利生担任美国驻伦敦大使馆二等秘书,以后升任一等秘书。战后,他在美国国务院负责远东事务(1946—1948),担任驻新加坡总领事(1950—1952)。在和日本谈判和平条约时担任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的特别助手。他还出任过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1952—1953),美国驻日本大使(1953—1957),驻印度尼西亚大使(1957—1958)。他由于同情印尼总统苏加诺而和美国国务院决策层发生龃龉,遂被调任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1958—1960),这也最终导致他在1960年6月离开外交界,到夏威夷大学任教。爱利生1978年10月28日在檀香山辞世。

爱利生曾于1973年出版回忆录《来自草原的大使(Ambassador from the Prairie)》,其中第三章讲述了他1938年在南京的经历。

詹姆斯·爱斯比(James Espy, 1908—1976)1908年3月23日出生在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父亲亚瑟·爱斯比(Arthur Espy)是当地富有的银行家,担任南俄亥俄州储蓄银行的总裁;母亲为伊丽莎白·戴维斯·西里·爱斯比(Elizabeth Davis Seely Espy)。爱斯比自幼在辛辛那

提长大,就读核桃山中学与休斯高中。此后进入耶鲁大学学习。1930 年从耶鲁大学毕业后,他曾在剑桥大学科珀斯·克里斯蒂学院深造一年,随后在辛辛那提大学修读法律课程。他于 1932 年在辛辛那提市福利局工作 6 个月。然后他进入银行金融界,主要从事贷款和房地产财会部门的工作(1932—1935)。

爱斯比 1935 年 10 月进入外交界,在美国驻墨西哥城大使馆任副领事。在外交学院学习数月后,于 1937 年 4 月被调往驻上海总领事馆,同年底随爱利生、麦克法瑾前往南京。虽然在困苦紧张的环境里工作,但爱斯比在南京工作勤奋,效率极高,展现了他在进行调查、整理材料、撰写报告等方面的出众才华。记载日军在南京暴行最重要的两份长篇报告即由其整理撰写。他也多次向日本当局抗议日军侵犯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的财产。爱斯比 1938 年 6 月 3 日离开南京,奉调至驻广州总领事馆。1938 年底晋升为三等秘书,调任驻东京大使馆直至珍珠港事件爆发,他也和其他在日本的美国外交官一道被日本当局羁押了 6 个月。

此后三年,爱斯比在美国驻中东的使领馆任职,1942 年 7 月在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总领事馆工作,同年 10 月调往驻埃及亚历山大港总领事馆,1943 年 4 月到驻开罗大使馆,并于 1944 年晋升为二等秘书。战后,他于 1947 年奉调回华盛顿,在国务院担任北方与西部海岸事务的助理主管,1948 年被调至驻玻利维亚拉巴斯大使馆任一等秘书。1951 年任职驻奥地利维也纳大使馆,1952 年为驻奥地利萨尔茨堡(Salzburg)领事,1953 年任驻锡兰科伦坡大使馆公使,1956 年担任驻乌拉圭蒙得维的亚大使馆公使。爱斯比 1963 年退休,1976 年 1 月 27 日在华盛顿特区逝世。

小阿契包德·亚历山大·麦克法瑾(Archibald Alexander McFadyen, Jr., 1911—2001)1911 年 8 月 20 日在中国江西庐山牯岭出生于一个美国传教士医生的家庭。其父阿契包德·亚历山大·麦克法瑾长期在徐州行医,1938 年夏曾向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报告日军占领徐州后的

残暴行径。^① 小麦克法瑾在中国长大,曾就读于上海的美国学校,以后回美国乔治亚州罗马小镇上中学,1935年毕业于北卡罗莱纳州的大卫逊(Davidson)学院,主修经济学。大学毕业后即返回中国,供职于中华全国饥谨救济委员会。

他于1937年4月在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开始了外交生涯。同年底前往南京,参与了调查日军暴行及美国财产和权益遭破坏、损失的工作。他在南京工作的时间短暂,于1938年3月13日奉调回上海总领事馆。

珍珠港事件后,他在上海和其他美国外交官,包括总领事弗兰克·普鲁特·洛克哈特(Frank Pruit Lockhart)一道被羁押了6个月,直至1942年乘坐交换外交人员的船只被遣返。此后,他先后任职于美国驻乌拉圭蒙得维的亚大使馆(1942年9月),驻重庆大使馆(1943年10月),驻昆明总领事馆(1943年12月),并晋升为副领事。战后,他辗转于世界各地的使领馆工作,包括驻上海总领事馆(1945年9月),驻天津总领事馆(1946年1月),驻爱尔兰都柏林大使馆(1946年9月)和驻加拿大多伦多总领事馆(1949年2月)。

1950年,他被调回华盛顿,在国务院任职。然而,1955年10月,与他相伴17年的妻子海伦·叶茨(Helen Yates)的逝世对他的打击很大,尤其是另一个家庭悲剧接踵而至,他的长子在1956年1月病逝,使他难以承受。他的精神和健康状况迅速恶化,导致他无法继续在外交界工作,病退离职。此后30年,他在佛罗里达州的圣彼得堡生活在社会的底层,靠打零工、杂活,诸如在餐馆厨房洗碗谋生。他于1962年与爱瑟·肖布(Either Schaub)结婚,并于1986年移居纽约。麦克法瑾2001年3月1日在纽约州克林顿的凯瑟琳·路德之家老人院去世。

① A. A. McFadyen (A. A. 麦克法瑾), 给弗兰克 P. 洛克哈特(Frank P. Lockhart) 的报告“Hsueh Incident (徐州事件)”的附件—“Looting, Raping and Murder by the Japanese Army on Entering Hsueh, Kiangsu Province (日军攻入江苏省徐州之际的掳掠、强奸、屠杀)”, 1938年7月29日, 美国国务院档案编号 793. 94/13752, 美国国家第二档案馆, 59 档案组国务院档案, 微缩胶卷 M976 组, 56 卷。

1938年5月4日,另一名美国外交官,三等秘书查尔斯·阿尔伯特·库柏(Charles Albert Cooper, 1908—1960)抵达南京,作为5月去上海休假的爱斯比副领事的替换官员。爱斯比6月3日调往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之后,库柏接替爱斯比的工作。库柏1908年10月21日出生于内布拉斯加州的小镇洪堡(Humboldt),1930年毕业于内布拉斯加大学,是爱利生的校友。大学毕业后,他进入华盛顿特区的克劳福德研究生院,准备从事外交职业,并于1931年9月开启了自己的外交生涯,在美国驻法国勒阿弗尔(Le Havre)领事馆任职员,同年12月晋升为副领事。1932年12月被调往驻广州总领事馆。1933年8月起在驻东京大使馆参加强化学习日本语言、历史和文化的训练班,再度和爱利生成为前后同学。1935年至1937年,他在驻日本东京大使馆和名古屋总领事馆任副领事。1937年10月调至驻上海总领事馆,1938年5月前往南京,并晋升为三等秘书。

库柏抵达南京之际,暴行案件的数量已大为减少,但他参与了为美国公民申报财产遭日军破坏所受损失索赔的工作,并为这些美国受害人准备宣誓作证的材料。他在南京工作到1939年7月。

珍珠港事件爆发之际,他在驻东京大使馆任三等秘书,并被羁押至1942年9月遣返回美国。由于羁押期间及遣返途中生活条件极差,回美国不久即患中风,并从未完全康复。结果,他一度丧失了说话和走路的能力,无法继续工作,不得不离职,回老家养病。病情稳定时,能够为家庭办的企业做些会计之类的工作,但最终于1960年6月3日在老家洪堡病逝,年仅51岁。

三

刚刚抵达南京,爱利生及其工作人员就与那些留在城内并目睹暴行的美国居民会面,并着手对美国财产损失开展正式的调查。虽然在所有的美国房产上都张贴着中文、英文和日文的官方布告,希望日本兵尊重

这些房产，但这显然是徒劳的。美国外交官从传教士那儿听说：

大使馆三等秘书道格拉斯·简金斯的小别墅遭洗劫，留在屋子里的中国仆人遇害。这再真实不过了。小别墅被完全毁坏，房门只有一个铰链还连着，窗户被打破，书籍、文件、破损的床单、枕套、撕破的地毯四散在地板上。显示这是美国财产的告示被撕成两半。仆人的尸体已被搬运走。我们发现许多美国人家里的情况相似。最大的一座房屋座落在城市边缘的一座山丘上，显然在炮火线上，几面墙壁上都有被炮弹射穿的大洞，屋顶大部分被烧毁。炮击之后，日本兵蜂拥而过，大部分可以搬运的家具都被劫走，还有盘碟、餐具、床单、毯子，以及任何可以塞进衣袋里的东西都被席卷而去。看房子的中国人还在那儿，只是身首两处，躯干在后花园，头颅在前面的花园里。”^①

根据美国居民的报告和他们自己的调查，爱利生就侵犯美国财产的行为多次向日本大使馆提出抗议，还将有关日军暴行的报告及其他电报几乎每天报告给美国国务院和美国驻中国与日本的其他外交机构。爱利生一天之内发送数份电报的情况也并不少见。1938年1月9日，《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大使馆三等秘书约翰·爱利生在给驻华大使纳尔逊·T. 约翰逊的电文中报告了自从日军占领南京以来，美国财产遭到大规模洗劫的情况。”^②数天后，《洛杉矶时报》报道了另一个类似的事件：“国务院今天宣布，驻南京领事约翰·M. 爱利生已照会日本大使馆，尽管先前美国提出抗议，但日本兵持续闯入美国产业，抢劫美国机构的商品，劫持机构的员工。”^③美国人的抗议似乎并没有制止这些非法的行为，与此同时，爱利生持续不断地提出抗议。1938年1月23日，他的抗议报告再次出现在《纽约时报》上：

① 约翰·M. 爱利生，《来自草原的大使》，第36页。

② F. 提尔曼·杜丁，《美国财产遭洗劫》，《纽约时报》1938年1月9日第1版。

③ 《再向日本提出抗议》，《洛杉矶时报》1938年1月15日第3版。

虽然美国通过驻东京的大使约瑟夫·格鲁数次提出正式抗议,但美国国务院今天从身处沦陷的中国首都的美国领事约翰·爱利生那儿获悉,日军仍在南京抢劫美国人的财产。美国人的房屋中有一定数量的财物被抢劫走,有一次,在美国建筑物中躲避的 10 名中国妇女被强行劫持走。……

“他报告的最近一个,也是最明目张胆的案子,”公告说,“发生在 1 月 18 日上午,日本军人与两辆卡车进入属于联合基督教会的大院,搬运走一架钢琴和其他财物。在搬运钢琴的过程中,他们毁坏了一大段院墙。爱利生领事进一步报告,他多次提请日本大使馆注意这些问题,但这些仍然每天都在发生。”^①

由于爱利生的报告,日本外务省向南京的外交官发出指示,东京最高统帅部也命令上海和南京的日军当局“禁止擅自闯入美国房产”。^② 结果,爱利生的报告极大地激怒了南京的日本当局和军人。代总领事福井淳公然指责爱利生“只听信那些偏护中国人的美国传教士”以及他“不应过于轻信他们的申诉”。为了反驳这一指责,爱利生决定“亲自调查下一个报告来的日军非法擅闯的案件”。^③ 他根本不必等待。当天下午就有人向他报案。

1938 年 1 月 25 日,任教于美国机构金陵大学的马内·舍尔·贝茨报告说,前一天晚上,全副武装的日本兵强行闯入金陵大学的农具店,绑架了一名中国籍女性员工。那个妇女说她被强奸了 3 次才被释放。贝茨和另一位任教于金陵大学的美国人,查尔斯·亨利·里格斯询问了这位妇女,向她了解情况。她指认自己被强奸的地方是天主教牧师以往的住所,后来被日本兵占用。爱利生就此案照会了日本大使馆,并安排与

① 《日本人在南京持续掳掠,美国领事提出正式抗议》,《纽约时报》1938 年 1 月 23 日第 35 版。

② 同上。

③ 约翰·M. 爱利生,《来自草原的大使》,波士顿:豪顿·米弗林(Houghton Mifflin)出版公司,1973,第 39 页。